**宣教實踐**

**淺談唐朝景教來華之因由及沒落**

**溫以諾、周新生**

## **前言**

本文撰寫目的在淺談唐朝景教來華之因由及150年宣教後的沒落。

本文組織，先是分析景教來華的四個因素: 經濟、政治與文化。繼而指出

景教沒落的五項因素: (一)唐代廢佛毀釋的經濟原因; (二) 政治文化的因素; (三) 宗教方面與佛教、道教、儒家太多耦合,無法傳純正的道; (四) 傳教族群的局限性, (五) 教派纷争与内部腐化。最後的總結: 沒有落實本土化、生根發展、景教與天主教之間紛爭、內部腐化等衰敗的原因。

## **景教東傳來華的過程**

 據景教碑碑文記載：貞觀九年，有大秦國（波斯）大德（主教）阿羅本來到京都長安，受到唐太宗的禮遇，太宗遣宰相房玄齡到西郊迎接，一直迎入宮內。 貞觀十二年，皇帝下詔，稱此教「濟物利人，宜行天下。 」乃以國費在義甯坊建大秦寺，置僧21人。 此為文獻所載景教流行中國之始。

* 「 635年（唐貞觀九年）該派傳教士終於到達中國京城長安，其教被稱作「景教」。

 在635年之前，阿羅本就可能已在長安以西的中國邊陲地區傳教，且很有影響，乃有人報告朝廷。故太宗隆重接待之。至景教碑建立之時（781年），景教已經歷了140多的流播和發展，進入黃金時期。 一時有所謂「法流十道、寺滿百城」之盛。

 聖歷年（698—699）與先天末（712），景教曾與佛道二教展開鬥爭，景教顯然處於守勢，因有僧首羅含與大德及烈「共振玄綱，俱維絕紐。 」

 玄宗嘗命其五個兄弟到教堂行禮。 彼時且有僧佶和來朝，「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行七人與大德佶和于興慶宮修功德」（做禮拜）。

 天寶初年，命大將軍高力士將太宗、高宗、睿宗、中宗、玄宗、五宗的寫真畫像，送到教堂內安置。

一些景教士且獲得封號，賜紫袈裟；還有「賜天香、頒禦饌」的榮龐；一些教堂的匾額，也出自御題，即「天題寺榜、額載龍書」。 建碑以後，景教又經歷了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幾朝皇帝，教務順利，但亦平淡，無大發展。」[[1]](#footnote-1)

## **景教東傳中國的原因**

### **景教東傳中國的經濟原因**

**中國與波斯的陸路交通**

 景教傳入中國的原因最主要的還是經濟的原因;因為當時中國與波斯之間已經開闢了交通路線,外交使節,商旅,傳教士,可以透過交通路線往返。當時以陸上交通為主,比海上交通更早,且陸路交通成為當時政治與經貿的必經之路。

***絲絹與寶石、香料的交易***

 當時的國際貿易,無疑是以絲絹為主要商品,中西交通是以經濟為主要背景,為此經貿的利益,才需要政治與軍事的力量維繫經濟命脈。絲絹長時期是中國與西域各國貨物交換的媒介,舉凡今日東方學者,以中國生絲輸入西域,所經之路稱為「絲路」。中國可以交換印度,波斯,羅馬那些物品呢?琉璃,刺繡,毛毯,藥材,香料,香木,沿途購買的寶石。寶石與香料是當時最重要的貨物。

#### **國際貿易都市**

景教徒自敘利亞,波斯,隨西域商旅來到中國;一路上,景教徒在聚集之處建立教堂,這些地方或駐有主教,成為景教的據點,因著經濟活動而建立起來的交通網路,也成為當時中國國際貿易都市興起,景教徒即是透過這樣的交通網路與商業活動,傳福音進入中國。

#### **景教徒的經濟活動**

景教徒從事經濟活動,有其生活所需,他們也受當時政治與宗教的迫害,例如受波斯政治迫害而逐漸東來;受伊斯蘭教的迫害,成為伊斯蘭貴族的侍從。然而他們依照初代基督徒的習慣,「初期基督教時代，大概還是極小規模的組織團體，他們也任命主教或長老，但當時的主教或長老，好像只是巡迴牧師似的，從此方移往彼方傳佈福音，只要可能也和俗人一樣生活，他們大半和《使徒行傳》中所見保羅事蹟一樣，不是經商的人，則或為木工，或為鍛冶，或為機織，從蘿手工業以謀自己生活。 這雖是後話,但他們如此布教方法，竟激起僧權主義者的不平之聲，責備他們原來就是商人，卻動不動舍卻自己天職，而假裝做僧侶、長老，所以要反對了。」[[2]](#footnote-2) 商業活動是景教徒的特點,他們喜愛買賣,旅行各地是否景教徒是因經濟活動而傳教至中國,是經濟活動為主導?還是有全職的傳道人像保羅一樣,沿商業活動城市建立教會,旅行至中國,也在中國建立教會?這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商業宣教模式.

### **景教東傳中國的政治原因**

#### **中國與波斯的國際關係**

波斯受伊斯蘭教的壓迫約在公元635-641年,而唐貞觀9年是公元635年,景教碑中之阿羅本來中國,正是貞觀9年。那時波斯正在危急存亡之秋,而波斯介於歐洲與中國之間,波斯與中國有商業往來,在政治上也有來往,阿羅本是否兼具官方代表來中國,值得探討.「自(玄宗)開元十年(722) 至天寶六載 (747) 凡十遣使來朝, 並獻方物。 」正因為唐代帝王對於波斯有外交之親善關係，所以波斯人多來唐避難，從唐太宗、高宗、中宗、玄宗以至德宗，波斯人在唐任顯官者不少。

**羅含即波斯人阿羅罕僧首**

 即就景教徒言，在景教碑文中有官銜者即有二人，如伊斯為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殿中監，僧業利則為試太常卿。」[[3]](#footnote-3)在唐高宗時(公元656-660年),擔任唐朝〝拂林國諸蕃招慰大使〞阿羅罕(Abraham),與碑文中“僧首羅含”實為同一人。阿羅罕也成為景教的宣教士之一且為其首。從這些資訊,我們可以了解景教徒與官府的關係密切。因為這層關係,在當時唐代,似乎沒有在官府的遮蓋之下,在各地很難在沒有官方允許之下建立教堂與傳教。

####  **商人與傳教師**

 來中國朝貢的商人與使節已經媒合,有官方的記載如下: ﹤冊府元龜﹥卷九七一記: “開元二十年(732)九月，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與大德僧及烈朝貢” ﹤冊府元龜﹥卷九十五記: “開元二十年八月庚戌, 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與大德僧及烈朝貢。授首領為果毅,賜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放還蕃。”他們有可能是商人,為了方便,冒充為使節進貢,這樣方便進出來回。是否商人真的混在真正的使節當中,是否有景教徒,因通商與政治因素,開了方便之門,他們就藉此機會在唐朝建立教堂,發展教務,也許他們的福音宣教策略跟商業與政治緊緊相連。

 唐朝也實行隋朝的政策,就是統治宗教,維護政權。當時佛教是外來宗教,利用宗教來維護政府的統治階級利益,因此利用宗教,就大肆提倡佛教。當時外來宗教者眾,如祆教,摩尼教,包含了景教,景教雖是較小的,勢力不大,但亦受到唐朝廷歡迎,教勢發展長達一百五十年之久,根據景教碑文所載, 「貞觀十二年秋七月, 詔日: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義甯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4]](#footnote-4) 這是在長安奉旨建立的第一所景教堂,指標性的教堂,稱大秦寺,裡面的教士達21人。

#### **唐代的民族政策與宗教政策**

 當時唐朝三百餘州分為十道,碑文上記載:「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可見景教已經建教堂於唐朝各地。寺滿百城,告訴我們景教的廣傳已遍滿各大城。唐玄宗時,令其兄弟等五王,親臨教堂,重建祭壇,重新裝潢。天寶初年,令大將軍高力士送先朝五帝畫像,安置於教堂之內,且親提匾額。唐肅宗時於靈武等五郡重新建立教堂。當時郭子儀每年集合四間教堂的傳道人或稱教徒,一起恭敬慶祝五旬節。這是政府支持的基督教宗教節慶。

 「7世紀，聶斯脫裡派的傳教活動已遍及中亞，並進一步向東推展。635年（唐貞觀九年）該派傳教士終於到達中國京城長安，其教被稱作「景教」。據景教碑碑文記載：貞觀九年，有大秦國（波斯）大德（主教）阿羅本來到京都長安，受到唐太宗的禮遇，太宗遣宰相房玄齡到西郊迎接，一直迎入宮內。 貞觀十二年，皇帝下詔，稱此教「濟物利人，宜行天下。 」乃以國費在義甯坊建大秦寺，置僧21人。 此為文獻所載景教流行中國之始。 由此可以推測：在635年之前，阿羅本就可能已在長安以西的中國邊陲地區傳教，且很有影響，乃有人報告朝廷。 故太宗隆重接待之。 景教由此得到唐朝之承認和容納，可以奉旨公開推展教務。」[[5]](#footnote-5)

 景教徒與政府的關係發展的如此密切,是否是政治利用宗教,掌控宗教,藉此掌握民心,穩固政權。景教領袖們是否真正將福音傳入政府的各階層,深入社會民心,這樣的宣教策略,我們只看到被框架起來的骨架,缺少福音性的活動在社會基層老百姓,也未聞歷史記載有廣大人群接受福音,一但被政府框架起來的骨架倒了,整個教堂在各地的宣教工作也即刻受到了限制與虧損。主導權受限於政府.這是宣教策略中的致命傷之一。

## **景教東傳中國的文化原因**

#### **景教徒的高度技術生活**

 當時希臘文化比較文明,景教徒活動於敘利亞一帶,承襲了希臘文化所帶來的高度技術生活,因此當景教徒在中亞一帶傳教與活動的時候,風聲早已傳入唐朝皇帝的耳中。在635年之前，阿羅本就可能已在長安以西的中國邊陲地區傳教，且很有影響，乃有人報告朝廷。故太宗隆重迎接並接待之。

 當時景教徒的醫術在中亞一帶頗負盛名,他們也翻譯希臘文,敘利亞文的書為阿拉伯文,元朝初期蒙古是沒有文字的,元世祖時蒙古仿維吾爾文,而維吾爾文是仿敘利亞文;清太宗時,又仿蒙古文創造滿州文。景教徒傳教士們在東方文化史上的影響是很大的。景教徒成為敘利亞文與中亞,土耳其,蒙古之間的語言翻譯與創作的橋樑已是不可埋沒的事實與貢獻。

#### **大德及烈之「廣造奇器異巧」的作用**

「在景教徒隨使節到達長安之時，他們常常以貴重的舶來品獻給朝廷，或由來中國遊歷的波斯商人提供多額之運動資金，正是投合中國統治階級愛好奇巧珍玩之心理的。 例如在唐則天武后的聖歷年間(西元698-699)景教受了佛教壓迫，在先天年末(713年)，又受道教排斥，在此中國景教會正在危機之時，中國景教徵得到了波斯本國景教會的助力，使垂危之景教復顯而流行如故。 這其間的消息，見於景教碑文的是: 「聖歷年，釋子用壯，騰口于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于西鎬。 」這裡「用壯」「騰口」二義見周易，「下士大笑」見《老子》。

蓋言在聖歷年間，釋徒依眾恃強，肆口謾駡于東周，東周指東都洛陽;又在先天末年，無知小儒隨聲訕謗于西鎬，西鎬指西部長安。 而即在此際，從景教之總本山，奉法主之命來長安者，即: ‘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維絕紐。 」 這大德及烈即開元二十年波斯遣使朝貢之大德憎及烈。 他和僧首羅含二人皆以西方 (金方)贵冑(貴緒)脫俗高僧的資格來唐，來唐以後使景教會斷而復續，竟振興起來了。 這其間秘密，可參考《新唐書》和《冊府元龜》。 《新唐書》卷百十二柳澤傳，載玄宗開元中(713一了41)「有市舶使周慶立者，呈獻奇器為柳澤所劾」。 《冊府，元龜》卷五百四十六詳載其事: 柳澤開元二年(714年)為殿中侍御史、嶺南監造使，會市舶使有衛威中郎將周慶立丶波斯僧及烈等，廣造奇器異巧以進。 」[[6]](#footnote-6)這奇器異巧以進就是稀世珍品上貢於朝廷,得以化解其他宗教的壓迫排擠。

 當景教徒隨使節到達長安時,他們常以貴重的舶來品獻給皇帝,或者由波斯商人所提供的大量資金,這很符合當時皇帝的喜好,尤其是來自中亞一帶的科技文明,奇玩與貴重的稀世珍品對當時的中國皇帝而言,興趣當然很大。

 景教徒所獻的珍品,能讓中國的皇帝,龍心大悅。即便在景教碑中有出現佛教的壓迫,道教的排斥,景教都能化險為夷。特使也是景教徒的大德及烈後來得到朝廷的恩寵,給景教恢復名譽。

 景教徒獻稀世珍品給朝廷,與明朝天主教徒利瑪竇獻的時鐘給朝廷有相同的意思。是否致贈禮物的方式博取官位與開方便傳道之門,值得可取?或許是當時的環境使然。同時這也是景教徒的文化優勢,所開創出來的一條路。

**耶穌會士與景教傳教方法雷同**

 景教徒在不同文化的傳教工作,也有不同的本色化努力,力求與當地文化的妥協,避免衝突。例如在波斯面對拜火教(祆教),因祆教反對獨身主義,因此景教徒也帶妻子一同傳道。在中國的時候,在崇拜的儀式中,將敘利亞文改為中文，「如敦煌發現的《景教三威蒙度贊》即為好例。還有如中國景教徒之祖先崇拜及為死者求冥福,此皆投合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的心理，習慣，在這一點景教徒和明末來華的耶穌會士，畢竟相同，而且實為他們機會主義的傳教方法的先驅者了。」[[7]](#footnote-7)

 景教徒在中國的宣教策略的失敗之一,跟本色化太超過有絕對的關係。聖經中沒有為死人祈福禱告這方面的教導,宣教為了本色化而為之,已經跟聖經的教訓相違背。基督教信仰有其獨特性,絕對性的真理是不能因為本色化而有所妥協的。宣教士可以在穿著,飲食,語言,生活方面與文化認同,但是在三位一體的真理,童貞女生子,不可拜偶像,不可向死人祈福,都是不能妥協的真理。真理若失去了獨一性,如何在佛道教的夾擊中顯出真理的光,當福音不再單純是十字架的福音,教會怎能在神的恩典與同在中成長茁壯。

## **景教在唐元宣教衰微之原因**

### **唐代廢佛毀釋的經濟原因**

公元845年,即唐會昌5年,發生廢佛事件,景教受其波及,是衰微的起點,當時景教,祆教,與佛教,都被當作外來宗教,並且看待景教與佛教是類似的宗教,因此受到政府打壓,景教徒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令其還俗,本國人回歸成為納稅人口,外國人則遣返回國。政府打壓宗教的理由當然不是經濟因素,他們的理由是說這些僧尼耗蠱天下,欲去之。

至於廢佛的原因,理由是增進全國的經濟.「據《新唐書》卷五十二《食貨志》四十二: 「武宗即位，廢浮圖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 大秦、穆護、祆二千余人，上都、東都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 腴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等家奴婢，丁壯者為兩稅戶，人十畝」。當時拆毀寺院就有四千六百所,還俗之寺僧二十六萬五千人, 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這些人與田產,對當時的經濟自然產生助益。當宗教勢力擴增,產業龐大,影響到皇權時,自然引起朝廷的覬覦,這塊肥肉是在皇帝的嘴裡還是在僧人口裡?

當時政治權大於宗教權的唐朝,為了給宗教一個教訓,自然稱其蠱惑民心。收刮教產,是其背後的目的。朝廷對宗教是政策目的高於宗教信仰;唐武宗時,唐室國力今非昔比,武宗見天下僧尼豐衣足食,教產龐大,心裡自然不是滋味,因此並非宗教問題乃是經濟問題,大規模的廢佛行動。

景教徒與教堂所受到的牽連與損失,沒有正確的數據可以參考。教堂被拆毀,景教碑之淹沒,即為意料中事。當時西域已淪吐蕃掌握,東西往來也不如唐初盛世時之便,此時的絲路多為不便於交通,外國來的景教徒若被遣返,將會死於返國之路途。也因此景教受到了非常嚴酷的打擊。

唐武宗廢佛隔年即病故,唐宣宗(公元847-859年)即位,他便收回先帝的廢佛的命令,重建寺院,想必春風吹又生的景教徒必乘此時機,力圖恢復教勢.是否有跡象顯示景教徒仍存在中國?

「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黃巢起義時,死守廣東城而戰死的人間,有阿拉伯人,猶太人,波斯人,其中即有景教徒,」[[8]](#footnote-8)可見廢佛事件並未讓景教徒完全消失。

### **政治文化的因素**

a.唐武宗時,當時西域的交通已堵塞,景教徒與敘利亞的教會失去聯繫,沒有使徒性的來往拜訪堅固,也沒有母會的支援與幫助,漸漸屬靈上失去信仰上的力量。

 b.因武宗廢佛,景教徒得不到朝廷的保護,以致受牽連,造成莫大的損失。沒有政府的支持,在當時環境是很難生存。

c.當時佛教傳入中國的佛教經典有五千零四十八部,而景教的五百三十部,相形之下,在文化的影響層面與深根民間信仰,顯然落後於佛教。「相形之下，傳入中國唐代之佛典既有五千四十八部，而大秦本教經則不過五百三十部，正如唐舒元輿《重岩寺碑》所云「天下三夷寺，不及釋氏一邑。 佛教因得中國的保護，所以在武宗廢佛毀釋之後，旋即恢復，而景教則在中國文化的重大壓力之下始終不能抬起頭來。」[[9]](#footnote-9)

 d.「在政教關係及與儒家思想的關係中，景教完全自覺地將自己置於普遍王權之下。碑文大贊唐朝歷代皇帝，更言「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 」明末耶穌會士陽瑪諾《碑頌正詮》解釋說：這是「言國主助聖教廣，聖教助國主之光，蓋聖教流行之益，緣帝王從奉；居高作倡，大道廣敷，教法相資，而皇猷熙奏也」。 可見，景教傳教士認識到在專制帝國，宗教絕無在聖王之外謀求獨立發展之可能，乃自覺附隸屬于專制統治機器，以求自身之發展。 他們還大倡忠君、孝道思想，以尊君事父相號召。

景教可以說全面地與中國傳統文化及正統意識形態相妥協。[[10]](#footnote-10)景教妥協於政治王權是無可奈何的事,在當時的專制王權之下,所有宗教都是統一管理無一例外,景教徒想不順服,也無他法可行。因此,當與政權完全的掛勾之下,政權傾倒,教務就跟著傾倒。佛教能在中國生根與文化融合,這是他生存之道,也許正是景教過分倚賴政權的相反結果。

 景教對政治的過分依賴帶來了雙重的效應，首先，因其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朝廷,即上層官員，故在下層社會或民眾（由其是漢人）中沒有基礎，影響甚微；其次，對政治、政權的過分依賴意味著把自己的命運完全委託給它，政興則教興，政亡則教亡。與此同時，宗教的那種超凡脫俗的莊嚴形象亦因此受到損害。

 「宗教雖不能與政治無關，然關係過密，必將隨國家政策而轉 移。 ...... 胥當時景教以為榮龐者，而不知宗教之莊嚴已因是失墜。 ......

景教之隨唐宋易代而銷聲匿跡，其主要原因，即由於其附政治也。

 但對於以上結論，筆者卻頗有疑問：在中國，古代基督宗教與政權處於什麼樣的政教關係之中才是合宜的，即處於既不過密亦不過疏之中道？ 為什麼基督教在歐洲歷史上曾有過依附政治的時期，卻仍能持續發展？ 為什麼佛教在中國歷史上有過謀求獨立發展的時期，但卻又因此走向衰落？這些設問意在說明：不能停留在籠統的政教關係結論上，還必須說明政教關係中「政」的性質與結構。

 中國政治文化的傳統雖然在各朝略有因革損益，因而有所差別，但就其結構而言，则有一普遍特徵，即：一方面它缺乏從人格神那裡追求其統治正當性、合法性的檢驗來源這樣一個維度，另一方面它又追求臣民思想高度統一。前者使得崇奉人格神的宗教,在本質上成為政治統治不太需要的東西（雖然有時也有君權神授的說法和做法），後者則使得一切文化形態（包括宗教）都必須臣服于主流的正統意識形態。

 這使得外來宗教在中國面臨著一種兩難困境：如果過分依附于主流政治文化傳統以及代表著這種政治文化傳統的政權；那麼，它也就將自己的命運交付給了在時間長河中變動不居的俗物，隨之升降沉浮。 如果謀求獨立之發展，它不僅會喪失掉最強大、有生殺予奪之權的保護傘，而且會因走向民間而被主流文化的代言人（士大夫）目為妖術，民間宗教的命運大抵如此。[[11]](#footnote-11)

### **信仰及本色化的因素[[12]](#footnote-12)**

景教宣教策略的失敗，其中一個是信仰及本色化的問題, 景教在信仰方面走溶融妥協的路線.但未能培養翻譯人才及信徒學者,永遠無法改變附會在佛教框架之下，又未能使基督教信仰，先落實於中國文化的土壤，繼而開花結果的繁植下去。過度的本色化犧牲了基督信仰的立場。聖經中沒有為死人祈福禱告這方面的教導,宣教為了本色化而為之,已經跟聖經的教訓相違背。基督教信仰有其獨特性,絕對性的真理是不能因為本色化而有所妥協的。宣教士可以在穿著,飲食,語言,生活方面與文化認同,但是在三位一體的真理,童貞女生子,不可拜偶像,不可向死人祈福,都是不能妥協的真理。真理若失去了獨一性,如何在佛道教的夾擊中顯出真理的光? 當福音不再單純是十字架的福音,教會怎能在神的恩典與同在中成長茁壯?

 景教與佛教,道教,儒家太多耦合,無法傳純正的道。景教在中國與佛老之術語、思想相牽合，更在教理中融入儒家的忠孝觀念及祖先崇拜。如：「真常之道，妙而難名。 功用昭彰，強稱景教」，完全是仿《道德經》中「道常無名」與「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名之曰大」的表述方式。 碑文中還引用了貞觀十二年秋七月詔文（略），從中可見有唐歷代君主所以歡迎景教，正是因為他們認為景教教義與老子五千言相合。 碑文又曰：「宗周德喪，青駕西升。 巨唐道光，景風東扇」，這分明是影射周末老子乘青牛西入流沙的傳說，喻景教東來，是再興老子之教。 說明景教為了擴張其勢力，求得並存與發展，附會了道家道教的思想和教義。 在修養方法方面也有類似的例子。

景教也附會佛教，景教碑、《三威蒙度贊》屢屢援用佛家術語：妙有、慈航、世尊、僧、大德、法三、慈恩、功德、大施主、救度無邊、普救度，乃至以佛稱天主，景教徒（敘利亞來的傳教士、神職人員）悉以僧自稱，以貝葉梵音稱景教經典。 景淨（碑文作者）還曾參加佛典的翻譯工作。

當人民以為景教是外來佛教的一支,翻譯景教經典大量使用佛教用語,翻譯工作也是由朝廷官辦主導,翻譯者同是具有官方身分也同時是翻譯佛經之人,把先知使徒稱為法王,把傳教士稱為僧,怎麼看都不像是基督教。一旦政治上經歷廢佛事件,難保景教徒不受摧毀。

當基督教的信仰不能單純的傳講聖經真理,不能傳創造性的獨一真神,反而參雜了其他宗教色彩與思想,這樣的福音很難永世留存,在景教這個名稱上就直接受了影響:「自從天啟年間發現景教碑後，世人對景教之名多有解釋。 明末的中國天主教徒李之藻嘗撰《讀景教碑書後》，其言曰：「景者大也，火照也，光明也。 」明末來華的耶穌會士陽瑪諾則說：「景者，光明廣大之義」，教者，教會也，言信仰景道之人締結之團體。」 景教是非基督教徒所取的名稱,雖不滿意,卻只好接受,這也說明當時景教徒對翻譯經典的無奈與無助.既然如此,教會怎麼能長遠發展而歷久不衰呢?

「雖然漢語景教文獻幾乎較全面地介紹了基督教教義，但由於景教在唐朝採取了附會佛道的傳教策略，而且走得過遠，又沒有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漢語神學語言，以至它在唐朝傳播200多年後，各種唐代史書都以之為佛教的一支，五代和宋朝則沒有任何關於景教的記載。 這說明，就傳播方而言，唐朝的景教實際上沒有彰顯基督宗教作為世界性大宗教的真實面目。」研讀這些關於景教的資料,其實景教的宣教策略並不是自發性的願意附會在佛教裡面來發展,是專制政權之下的統一管理,也許佛教先於景教來中國發展,有天時地利人和之便,以至於景教,祆教,都是附會在佛教裡發展,就朝廷而言,他們看的不是宗教內涵上的差異性,他們看的是都是外來可掌控的宗教,對朝廷政權經濟有益,他們就統一管理利用之。

 景教徒令人婉惜之處,是沒有培養屬於自己的翻譯人才,在將近兩百年的時間,他們有足夠時間可以使用官方語言,用符合聖經的神學詞句來翻譯經典,雖然翻譯權仍在朝廷手中,但是不努力培養翻譯人才,永遠無法改變附會在佛教框架之下的事實。況且景教並未與中國社會、文化產生實質性的對話、衝撞，沒有對中國文化、社會構成正面或負面的刺激。除了景教碑之外,很少社會層面的歷史文獻記錄提供我們參考, 讓我們知道景教在本色化方面的努力有哪些。

### **傳教族群的局限性**

 「唐元兩代的基督宗教有一引人注目的特點，即：他們傳播的物件 和皈化的信徒，要麼是皇室成員和名公巨卿，要麼是漢人之外的少數民族和外國人。 唐朝時，景教傳播物件主要限於皇室、名公巨卿以及從西域來到大唐的商人和使臣，關於漢人信奉景教的記載似乎很少。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雖然羅列、頌揚了很多皇帝，但實際上諸位皇帝只是容忍、贊同傳播景教，沒有一位皇帝真正受洗入教。 大唐以其特有的博大的文化心胸和自信，向一切外來文化敞開大門。 摩尼教、景教等外來宗教（包括佛教）由於得以各行其道，流播發展。 元朝以武力入主中原，土廣民眾，加上其宗教傳統本來就是多神的，故對各種宗教兼收並蓄，來者不拒，景教、天主教、佛教、回教都可以傳播。 這方面也頗與唐朝相似。但是，元代景教的傳播物件非常有限：只在蒙古人和色目人中流行，似乎沒有向漢人和南人滲透的嘗試。 這樣，當漢人的政權明帝國取代入主中原的蒙元帝國時，附麗于蒙古人政權的景教（包括天主教）竟被當作蒙古人政權中的一種建置（Institution）被廢置。 敵人的朋友就是敵人，這是很易理解的一種文化邏輯。至論元朝之天主教，其傳播物件也限於蒙古人、色目人和邊緣地區的其他少數民族，很少有關于漢人信奉天主教的記載。 因此，莫爾在《一五五0看前的中國基督教》一書中寫道：古代和中古時代中國信徒的故事，並不是天主教的教會在中國開始成立的故事，卻多少在名義上是，或在實際上是信奉耶穌的外國人在中國久居，或是暫居的記載。

 此論可論諸當時西方天主教傳教士出使蒙古後，留下的各種關於中國各地基督徒及其宗教生活的記載，材料甚多，茲不贅述。

 元代的基督教不僅沒有向漢人滲透，甚至還因攀附蒙人政權而陷入 了與漢民族的深刻矛盾之中。 蒙古人當時將漢族置於賤類，乃至使儒生「十儒九丐」。 而在漢人心目中，蒙古人是以「夷狄」入主中原的。 蒙古人對漢人推行苛政，而對外來的傳教士則給予多方優待。 傳教士除獲得皇帝頒賜的俸金（很優厚）外，還擁有以下特權：「也裡可溫（景教天主教）軍籍之停止」（不服兵役）；「徭役之蠲除」；「租稅之徵免」。 近人陳垣對當時也裡可溫租稅之徵免還作過以下敘述：「元代對於諸教租稅之徵免，至少一定。 大抵太祖、太宗時，無論何人，均須納稅；至定宗、憲宗之間，則諸教士之田稅、商稅均行豁免。 ...... 也裡可溫之教徒...... 身雖奉教，而其人為農、為工、為商、為仕如故，未嘗因奉教而必須脫離其職業，故其教徒比他教為盛。 豁免租稅，于國家收入，影響至大」。 如此損失的稅收大概只能轉移到漢人頭上，從而可能激化了漢蒙之間的對立及漢人對外來宗教的憎惡。

 蕭若瑟在《天主教傳行中國》一書中，對元代基督教衰滅的原因作了以下分析總結：其故有二：一，元時北平各處，外籍客民最多，西域各部落人，與元之皇家同種，更不知凡幾。 凡此諸人，彌漫于官商兵各界。 以理度之，當時奉基督教者，此類客籍人居多。 而士著之華人，實居最少數，是以元祚既覆，若輩亦各回本籍，或隨元主北遷，此一故也。 二、蒙古以韃靼入主中國，恒為國人所切齒。 一旦失勢，洪武君臣，即乘機力行其排外主義。 凡蒙古所建設，如上都宮闕之類，悉數削平；而于其保護之教徒、教士、教堂，則更無所顧惜，北平之三教堂，早已毀滅無蹤矣。 此又一故也。」[[13]](#footnote-13)

 景教徒在唐朝的時代多為商人與傳教士混合一起行動的宣教隊伍,當他們歷經千山萬水的遠道東方中原,他們所面臨的不是一塊柔弱的土地,乃是國勢正強盛的大唐盛世,在語言與文化的適應上尚且艱辛,又面臨已存在多年的佛道教勢力夾擊,他們別無選擇,只能採取完全順服朝廷的安排,在朝廷的保護傘之下,他們可以為官,經商,建立教堂.也許他們有自身的利益或朝廷自有宗教政策,他們連聖經翻譯與在哪些城市蓋教堂都需要政府的協助。因此他們就圍繞在政府官員,公卿達貴之間,還有接待遠道而來的商旅之間傳福音。

景教徒宣教策略的失敗點之一,是眼光只專注政府高層與達官顯貴和同樣是外國來的商旅傳福音。如果說是唐朝的宗教政策與管控使他們受限於某些城市教堂,這也不盡然,因為大秦寺不下百間,如果佛教,道教可以深入民間,何以景教徒不行呢?既然已建立大秦寺,何不以教堂為中心向週遭城市居民宣教?顯然傳教士語言問題與信仰本色化問題沒有落實,景教在中國約150-200年,對中華文化沒有產生融合與深入民心,沒有建立本土的傳教士人才培育,讓教義與文化對話,產生文化的刺激與共鳴,讓更多華人成為教會領袖,華人帶領華人,一代傳承一代。

唐武宗的廢佛行動.雖重重的打擊了佛教,道教,景教,祆教。但是隔年唐宣宗(公元847-859年)即位,他便收回先帝的廢佛的命令,重建寺院,佛教道教恢復元氣,何以景教重傷不起?原本打擊的是佛教,結果受牽連的景教反而難以恢復榮景。

這就是宣教策略只重視朝廷與達官顯貴與外來商旅,沒有與民眾產生認同與文化的共鳴。當失去信仰生活本色化或與民眾生活價值觀的連結,教堂存在與否,民眾是不會有感覺的。因為信仰的本質不在教堂的建築物乃在信徒的信心與生命。

### **教派纷争与内部腐化**

 「教派紛爭一指古代基督宗教與流行中國的其他幾大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蘭教之間的紛爭，二指基督宗教內部的景教與天主教之間的紛爭。 茲先述前者：景教碑碑文的作者景淨是敘利亞人，據佛教文獻《貞元新定釋教目錄》所載，他與當時的佛教僧侶關係很密切。 但據他的碑文所載，最初對景教發起攻擊的正是佛僧。 碑文曰：「聖歷年（武則天年號699-700）釋子用壯（得勢而處於極盛）騰口（謾駡）于東周（洛陽）。 」稍後，道，儒也對景教發難，「先天（玄宗年號712-713）末下士（老子《道德經》第四章曰「下士聞道，大笑之」，故下士指道士或道家道教）大笑訕謗于西鎬（西安）」，由於僧首羅含和大德及烈的極力維持，才使景教度過難關。 這說明景教在唐朝時便曾遭到本土各大宗教的排斥。 景淨之向佛教示好，也許是吸取歷史教訓，不得已而然。

據朱謙之分析，景教還因伊斯蘭教的勃興和壓迫而,在鐵木耳施政之前就已在經濟上呈現衰頹之象。 鐵木耳施政時，因其皈依伊斯蘭教，對基督教施以強大的政治壓迫，乃至殘酷殺戮（1403）。M. L’Abbe Huc在《基督教在中國》（P421）一書中寫道：「鐵木耳是冷酷殘忍，好象嚴峻的天譴之鞭一樣掃過去了。 他是不知憐憫之情的冷酷男子，他荒廢了幾千都邑，殺戮了無數人民，把亞洲大好部分的住民化為屍山血河，以致遍地為廢墟所蔽而成為荒野」，這些地方也就成了基督徒們的埋葬所。 以上是就東亞、中亞之景教總體而言，若論元代中國景教之具體情況，有資料證明，在元代景教興盛時，景教與釋道兩種本土宗教亦多有相爭之事。 實際是佛教壓制景教。 如元仁宗尚佛，乃將鎮江金山景教寺寺頂上十字架以及寺內塑像拆毀，重塑佛像，且令也裡可溫子子孫孫勿爭，爭者坐罪以重論。景教在擴展教務之時，必會與其他同時流行之宗教產生矛盾。

據《元典章》一道諮文所載：大德間江南諸路道教所訟，謂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別無也裡可溫教門，近年以來乃有也裡可溫招收民戶，將法籙先生誘化。 引起強烈反應，乃至訟案。 可見道教亦參與了排斥景教之活動。

再看古代基督宗教的內部紛爭：在魯布魯克時代，景教徒對羅馬教廷派來的傳教士尚能保持一定的尊敬。 當魯氏進入和林城時，彼時當地的景教徒甚至都列隊于教堂前歡迎他，天主教徒和景教徒同在教堂做彌撒。 在蒙哥漢的宮廷裡，兩派的教士也能和睦共處。 基督教一時儼然為一普世宗教。

但是，當蒙高維諾來到漢八裡傳教時，景教徒卻以誣告將他送進了監獄。 蒙高維諾在寫給歐洲的第二封信中,對此有詳細記述這種紛爭無疑是一柄雙刃劍，不管獲勝者為哪一方，雙方都會受到損害。 獲勝者受到損害的是其宗教之莊嚴，致敗者則會大吃眼前虧。內部腐化也是唐元兩代的中國基督宗教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宗教往往為道德之象徵，一旦因教規鬆弛而產生內部腐化，則其本身將喪失發展之內部活力。 關於唐朝景教徒的生活情形，我們不得而知。 元朝景教徒的生活，則多有記載。 魯布魯克曰：他們（指景教徒）完全墮落了。

首先，他們是高利貸者和酒鬼，有些人住在韃靼人當中，甚至象韃靼人一樣娶好些老婆...... 他們是重婚者...... 他們是售賣僧職者，因為他們不免費行聖餐禮。 他們為老婆孩子操勞，因而一心發財，不顧信仰。至於誣告，更非教徒所當為。以上皆為天主教傳教士之記載，天主教視聶斯托裡派為異端，故以上記載或出於攻訐，僅供參考。

綜上所述，唐元兩代的基督教之衰滅，原因是多方面，最重要的是與政治的關係。中國政治的性質與結構說明，任何與之發生密切關係的宗教都會：隨此種政權之興衰而升沉浮降，或隨著統治者個人之好惡而決定自己的命運，決難產生一種聖俗政教良性互動的二元結構。本土宗教的排斥會使外來宗教難以獲得播種之土壤，教會內部的腐化墮落更會使自身喪失生存發展之內部活力。 這些既是古代

中國基督教衰滅之原因，亦是其所昭示之教訓。[[14]](#footnote-14) 景教在唐朝時便曾遭到本土各大宗教的排斥,很可能採取的宣教策略是靠攏朝廷與佛教友好,以至於在教名與翻譯經典都在佛教的翻譯人員下使用很多佛教辭彙,也可能是佛教勢力龐大,不得不在官辦的翻譯場內,雖不同意只好接受的翻譯事實,〝耶穌〞翻譯成〝移鼠〞,怎麼看都覺得不恰當。佛教道教排斥景教可見一斑。

上述景教在元朝時期,與朝廷綁得更緊,且在元朝時期天主教派遣使者來覲見皇帝,並互派使節,景教徒曾與天主教使節和睦相處,但也發生景教徒陷害天主教徒下監之事,以致天主教與景教互為攻擊,也許在教義上,因耶穌是否神人二性,耶穌的母親是否神的母親或只是人子的母親有很大的爭議,以至於在元朝時期,兩者之間互相排斥,從天主教的歷史紀錄裡面,視景教徒為異端,把景教徒說成高利貸者和酒鬼，他們是重婚者...... 他們是售賣僧職者，因為他們不免費行聖餐禮。 他們為老婆孩子操勞，因而一心發財，不顧信仰。至於誣告，更非教徒所當為。這些天主教的歷史記載是出於挾怨報復還是真實記載,不得而知.

景教似乎沒有像天主教一樣有所謂的教廷官方代表,以致在官方的發言權上,失去先機,即便在歷史上景教徒比天主教早到700年,但在中國的土地上,景教的影響力似乎沒有後來的天主教更有組織與強勢。在後來者的排擠之下,和漸漸被天主教所吸收,又因元朝的滅亡,景教徒成為明朝的敵人的朋友,也成為敵人,以致景教徒受到再一次的打擊。

## **結論:**

景教宣教策略失敗的一些反思

1. 景教徒看自己與中國人看他們,有一個共通點,都以為是外國人,是外來的宗教,沒有落實本土化,生根發展。是很重要的關鍵因素。
2. 「大部分在中國的景教徒是外國人而非中國人(漢人)，反而大部分的信徒多為邊疆維吾爾族(Uigur)或蒙古族(Tungus)的雇傭兵….。」[[15]](#footnote-15)

唐朝時，景教傳播物件主要限於皇室、名公巨卿以及從西域來到大唐的商人和使臣，關於漢人信奉景教的記載似乎很少。至論元朝之天主教，其傳播物件也限於蒙古人、色目人和邊緣地區的其他少數民族，很少有關于漢人信奉天主教的記載。沒有傳播福音給中國本體性漢族是最致命的忽略。

1. 「在中國他們未能培養本地的领導人、平信徒、和神職人員，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所列的72個人名中，僅有一個人名可能是漢人的名字。
2. 中國文化及哲學、教育和属靈環境的複雜程度超越外國人所能理解的範圍,因此當景教宣教士來到帝王制度的唐朝,自然只能配合與順從,無法滲入中國文化與社會。
3. 由於與穆斯林的交戰，642年波斯帝國陨歿,景教徒也受到了虧損。
4. 因基督教修道士和佛教僧侣(outlawing)在845年的决議，在第九世纪失去波斯帝國的寵愛和支援。
5. 黄巢之亂許多大城市被佔领和人民被殺。包括「景教」所剩下的人大部分也被殺害。景教徒的人數在中原一帶幾乎滅亡。
6. 基督教一夫一妻制的原则，在一夫多妻制的中國和穆斯林的社會並不受到歡迎。
7. 經常受穆斯林的骚擾，有時也受暴力的迫害。[[16]](#footnote-16)
8. 公元845年,即唐會昌5年,發生廢佛事件,景教受其波及,是衰微的起點。景教徒與教堂所受到的損失,沒有正確的數據可以參考.教堂被拆毀,景教碑之淹沒,即為意料中事.當時西域已淪吐蕃掌握,東西往來也不如唐初盛世時之便,此時的絲路多為不便於交通,外國來的景教徒若被遣返,且將會死於返國之路途。也因此景教受到了非常嚴酷的打擊。
9. 景教對政治的過分依賴帶來了雙重的效應，首先，因其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朝廷，即上層官員，故在下層社會或民眾（由其是漢人）中沒有基礎，影響甚微；其次，對政治、政權的過分依賴,意味著把自己的命運完全委託給它，政興則教興，政亡則教亡。與此同時，宗教的那種超凡脫俗的莊嚴形象亦因此受到損害。
10. 雖然漢語景教文獻幾乎較全面地介紹了基督教教義，但由於景教在唐朝採取了附會佛道的傳教策略，而且走得過遠，又沒有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漢語神學語言，以至它在唐元傳播200多年後，各種唐代史書都以之為佛教的一支，五代和宋朝則沒有任何關於景教的記載。 這說明，就傳播方而言，唐朝的景教實際上沒有彰顯基督教作為世界性大宗教的真實影響力。
11. 景教在唐朝的沒落，有信仰及本色化方面的因素。景教在真理方面的妥協，構成信仰破產。又因過度本色化(包括濫用佛教語詞，混雜佛道思想)，未能保持基督教的本質及特色。既乏翻譯人才又未培育信徒學者,以致基督教未能成功地植根中國文化。
12. 教派紛爭一指古代基督宗教與流行中國的其他幾大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蘭教之間的紛爭，二指基督宗教內部的景教與天主教之間的紛爭。景教在擴展教務之時，必會與其他同時流行之宗教產生矛盾。引起強烈反應，乃至訟案。景教還因伊斯蘭教的勃興和壓迫而在元朝鐵木耳施政之前就已在經濟上呈現衰頹之象。
13. 內部腐化: 內部腐化也是唐元兩代的中國基督宗教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宗教往往為道德之象徵，一旦因教規鬆弛而產生內部腐化，則其本身將喪失發展之內部活力。 關於唐朝景教徒的生活情形，我們不得而知。 元朝景教徒的生活，則多有記載。 魯布魯克曰：他們（指景教徒）完全墮落了。 首先，他們是高利貸者和酒鬼，有些人住在韃靼人當中，甚至象韃靼人一樣娶好些老婆...... 他們是重婚者...... 他們是售賣僧職者，因為他們不免費行聖餐禮。 他們為老婆孩子操勞，因而一心發財，不顧信仰。至於誣告，更非教徒所當為。以上皆為天主教傳教士之記載，天主教視聶斯托裡派為異端，故以上記載或出於攻訐，僅供參考。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 第57期2019年7月號**

1.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40-52頁。 [↑](#footnote-ref-1)
2. 中國景教 朱謙之著. 東方出版社 1993.5初版 P62 [↑](#footnote-ref-2)
3. 中國景教 朱謙之著. 東方出版社 1993.5初版 P64 [↑](#footnote-ref-3)
4. 中國景教 朱謙之著. 東方出版社 1993.5初版 P68 [↑](#footnote-ref-4)
5. 1840年前的基督教(北大上課講義: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孫尚揚 鐘鳴旦[比利時] 著 P28 [↑](#footnote-ref-5)
6. 1840年前的基督教(北大上課講義: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孫尚揚 鐘鳴旦[比利時] 著 P70-71 [↑](#footnote-ref-6)
7. 1840年前的基督教(北大上課講義: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孫尚揚 鐘鳴旦[比利時] 著 P72 [↑](#footnote-ref-7)
8. 中國景教 朱謙之著. 東方出版社 1993.5初版 P208 [↑](#footnote-ref-8)
9. 中國景教 朱謙之著. 東方出版社 1993.5初版 P209 [↑](#footnote-ref-9)
10. : 1840年前的基督教(北大上課講義: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孫尚揚 鐘鳴旦[比利時] 著 P34-35 [↑](#footnote-ref-10)
11. 1840年前的基督教(北大上課講義: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孫尚揚 鐘鳴旦[比利時] 著 P42-43 [↑](#footnote-ref-11)
12. 參閱下列中、英文資料：

Gareth Hughes, “Why did 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disappear?” November 16, 2016 Oriental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xford @ users.ox.ac.uk/~wolf2305/documents/china.pdf (retrieved June 1, 2019)

孙景尧, “**[成在此，败在此：解读唐代景教文献的启示 -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ved=2ahUKEwjh56S03Y_jAhWQ11QKHdw2ACoQFjABegQICBAB&url=http%3A%2F%2Fqktg.shnu.edu.cn%2Fskb%2Fch%2Freader%2Fcreate_pdf.aspx%3Ffile_no%3D0291%26year_id%3D2003%26quarter_id%3D1%26falg%3D1&usg=AOvVaw2CWXMtt0MtsPgTKZ1lh6Gm)**[,” (2003)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ved=2ahUKEwjh56S03Y_jAhWQ11QKHdw2ACoQFjABegQICBAB&url=http%3A%2F%2Fqktg.shnu.edu.cn%2Fskb%2Fch%2Freader%2Fcreate_pdf.aspx%3Ffile_no%3D0291%26year_id%3D2003%26quarter_id%3D1%26falg%3D1&usg=AOvVaw2CWXMtt0MtsPgTKZ1lh6Gm)

*[qktg.shnu.edu.cn/skb/ch/reader/create\_pdf.aspx?file...](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ved=2ahUKEwjh56S03Y_jAhWQ11QKHdw2ACoQFjABegQICBAB&url=http%3A%2F%2Fqktg.shnu.edu.cn%2Fskb%2Fch%2Freader%2Fcreate_pdf.aspx%3Ffile_no%3D0291%26year_id%3D2003%26quarter_id%3D1%26falg%3D1&usg=AOvVaw2CWXMtt0MtsPgTKZ1lh6Gm)*

聶志軍、”唐代景教的本土化策略——以词语释义为例” (2010) @https://wenku.baidu.com/view/425a87926529647d2728526c.html?sxts=1561848297750 (accessed June 1, 2019) [↑](#footnote-ref-12)
13. 1840年前的基督教(北大上課講義: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孫尚揚 鐘鳴旦

 [比利時] 著 P43-44 [↑](#footnote-ref-13)
14. 1840年前的基督教(北大上課講義: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孫尚揚 鐘鳴旦 [比利時] 著 P44-45 [↑](#footnote-ref-14)
15. 普世宣教史之研究(A Global Mission History) 郝安倫著 活石出版 P1 [↑](#footnote-ref-15)
16. 普世宣教史之研究(A Global Mission History) 郝安倫著 活石出版 P145 [↑](#footnote-ref-16)